

长安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五辑

1986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长安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五 编 目 录

1. 红军过引镇回忆	刘文礼
2. 民言社在长安县的建立及其活动	李志中
3. 民言长安支团简史	孙福志
4. 孔从周革命史略	张云程
5. 回忆孔从周部八年抗日战争纪略	张云程
6. 西安围城中的与王村战斗	柏宗蔚
7. 长安周乡“众民三十六弟兄”被捕事件	梁作仪
8. 记余海丰同志在“耀县起义”中的生活片断	王云深
9. 西安六省抗日救亡会	李香晋
10. 记周乡同乡会	于凤仁
11. 长安县农村特产名贵产品	李必蔚、李行山
12. 内苑板东漫谈	倪 朗
13. 红军撤离前后引镇商业	姚文光
14. 回忆长安引镇小学片断	刘文礼
15. 长安乡村基层宣讲所片断	刘文礼
16. 冯村社火	柏宗蔚
17. 郝耀东先生传略	梁作仪

红军进引镇回忆

刘文礼

民国廿四年（1935）六月十三，是引镇逢集的一天，也是农民“忙罢会”的日子。市上赶集、买菜、割肉人特别多，到中午集市最盛时，从人群中传出红军来了的消息，接着乱嚷嚷：“快往枣园一看（在引镇东约二里处），象蚂蚁穿线线的人向上拥！”人们喊：“真的红军来了，有的商店打（关）门，人们也纷纷走散。

顷刻，红军已到伪区公所（在街西龙渠西边），伪区长倪性初（宝和一个伪保长赵成吉没有逃脱。红军对伪区长说：“可给西安打电报，就说红军到了！”伪区长照办，西安答复是“无兵可调”。伪区长乘机就往东头土地庙（现派出所驻地）后跑去，向后看有人紧追，跑到店后那个大涝池里（现已建起引镇医院），几次上下翻腾后，被红军捞上来，放在碌碡上叫淌水，但没有救活。在红军进入伪区公所，一些赶集绅士，内有厘金局局长宋运生（都叫宋四少爷）正在逃跑，其中惠甘亭跳墙跑了。对被抓获的人逐一审问，将龙渠王四少爷（性初）、北留村王大先生（卓儒）放了回去，把宋运生和沿途捕的共九人枪毙在伪区公所西墙之下。

到了下午在街上先后逮住了牲畜税局局长姬棣笙（树堂）。为富

不仁的巩三，放高利贷的张学武，又去西街杂货铺永德裕逮住了劣绅王日中的一贯横行尹村的吊桶恩老八，共计四个人。到天才黑时，红军传呼群众到菜市（现基督堂东面）开大会，人们提灯、掌蜡前去参加，看到有些红军押着一个扁脸胡的人，背着一块白布，上写着“白匪警备一旅旅长唐嗣同”的黑色大字。唐低头站在会场旁边，先由红军领导人讲了话，后把收来“永顺堂”、“大丰亨”巨商号的布匹等东西分给到会人们，始人们尚有顾虑，经红军详为解释，才都拿走，边走边说：“谁说红军是红发吃人、共妻共产的，今天一见他们连咱们都一样，不拉夫、吃饭给钱，还给咱分东西，那里有这样好的军队。”

第二天天快明时，没听到吹号，也没听到喧嚷，红军向西南开走了，到子午镇把拉去那四个人杀了，把唐嗣同也杀了，把唐的头挂在城门楼上。

红军走后，人们都拥到伪区公所门前去看墙上贴的用白油印的布告，其大意是红军北上抗日路过此地，打土豪劣绅，大家不要惊慌，后边印着总指挥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详细内容记不清了，不知这高队的番号，伪军番号）；又在土地庙墙上和南街盐店柜台上用墨写了大字，记得有“枪口对外，一致抗日！”“联合起来，打回老家去！”等大幅标语。群众看后并互相议论着：“这几天街上卖油茶的人、市上赶工的人都多了，那都是红军的‘报子’，人家（指红军）早把啥都弄清了，你看后地根打的、拉走的、那有一个好人，人家一到，就给大操上（引渠西原上）把哨放上了。”

这支红军在引镇只住了一个晚上，他们的行动使人们明白了伪政府反动宣传纯属欺骗，认识到红军是打日本的，并不是骚扰百姓。从此“红军好”在群众中广为流传。这里当时有这样一段民谣：民国廿四年六月十三，红军出南山，在姚家寨借绳（距引镇不到一里，到尹家街（引镇）就把巩三拴。”由于红军热爱群众，纪律严明，行动机密迅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民青社在长安县的建立及其活动

李 志 中

我一九三六年在西安高中上学时参加了民先队，一九三七年加入了共产党，一九三九年转入农村搞党的地下活动。一九四〇年，在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高潮中，中共长安县工委奉命撤至陕北，我失去了和党组织的联系，在白色恐怖中摸索行进。恰在此时，遇到了李敦仁、武伯纶、郑竹逸等同志，并通过李敦仁的介绍，于一九四五年六月在西安民众教育馆填表参加了民主青年社。

“石忠士”的由来

一九四二年，我在长安县樊南乡汤房庙小学（简称汤小）任校长，经常启亚（党员）介绍认识了李敦仁、武伯纶、郑竹逸同志，当时李、武在兴国中学任教，我们过从甚密。一九四四年秋，国民党陕西省教育厅要在全省挑选五名小学校长去兰州西北师范学院进修，在刘云程督学的帮助下，我取得了这次进修的资格。临别西安时，李敦仁叮嘱我说：到兰州师院后，你和我通信的代号叫石忠士（即李志中三字的转化）。他还说，兰州的特务不比西安少，你要提高警惕，同时多结交进步朋友。从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上半年，我在李敦仁的关怀帮助下，在西北师院开展了一些工作，主要有：①摸清学生的政治倾向性，了解特务学生的活动情况；②集资在“北辰书店”入股（一股一百元），在那里购买进步书籍；③在长安同乡地下党员李凉

~ 5 ~

的领导下，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由李景耀、我、赵保仁、雷允中参加，由李景耀布置学习内容，统一学习某文章的某章节，然后约定时间，到校外河边交流心得体会；④经李景耀的布置，完成过一次张贴革命标语的任务。

在兰州西北师院的这些活动，我都用“石忠士”的代号向李敦仁做过汇报。李敦仁给我的回信，其内容不外乎谈学习，谈写作，谈“气候变化”（即讲形势），谈“不要受凉，防止感冒”（即还须精神警惕，切勿大意）。

长安县民青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一九四五年六月，我由西北师院进修毕业回到西安，首先去找李敦仁，他约我翌晨在民众教育馆碰头。第二天我按时来到民教馆，李敦仁、武伯伦早已在那里等候。我们三人先到鼓楼北牛肉馆吃了一顿牛肉泡，然后到民教馆，坐在三张破旧的藤椅上，边喝茶边谈天。我先向李、武汇报了在西北师院的活动，李敦仁低声简要地谈了西北的民主运动情况，然后告诉我，决定由我负责长安县民青组织的工作，联络地点就设在汤小，组织发展表格在武伯伦同志处领取（油印件），学习和宣传资料由李敦仁同志供给。

长安县民青组织从一九四六年三月开始至一九四七年上半年止，先后发展成员十五人，由我直接发展的人员有：

常启亚（汤小教务主任、地下党员）

董崇义(汤小教师。地下党员)

陈尊祥(汤小教师)

何明铎(汤小教师)

张淑阁(汤小教师)

刘瑞珂(汤小教师)

史 华(杜曲小学校长)

赵生瑞(秦岭小学教师)

杨悦林(二里村小学教师、地下党员)

由陈尊祥发展的民青社员有:

尤振邦(三角坡村小学教师)

南邦杰(南家坡村农民兼管中医业)

张维刚(秦岭小学学生)

再由尤振邦、南邦杰发展的民青社员有:

尤吉心(三角坡人)

李亚隆(李家庄农民)

长安县民青设立支部，支部书记由我担任。常启亚任组织委员，张淑阁、董崇义任宣传委员，刘瑞珂任文件保管委员。

当时，我、常启亚、董崇义、杨悦林四个地下党员都和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一九四六年，中共陕西省委特派张鸿太同志到长安，接上我和杨悦林的组织关系，同年又批准常启亚重新入党，接收陈尊祥为中共党员(董崇义的党籍一九八〇年恢复)。

长安县民青组织的重要活动

一、订阅进步报刊，开展宣传活动。长安民青当时订阅了许多进步书刊，如《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文化周报》、《新妇女》，以《民众导报》订的份数最多，仅汤小就订有四、五十份。汤小每村建立了“师生课余读报小组”，师生中阅读进步报刊，关心时事，蔚成风气。民青还发动进步师生，同时联络附近小学的教师，学，建立了许多“老碗会”读报组，放牛娃读报组。进步师生走出校门，给群众读《民众导报》，遭到国民党军官纵队的围打；民青组织还过一个《耕耘导报》。

二、废除封建法西斯教育，坚持民主办学。长安民青支部曾研究决定，战时学校教育应彻底改革，要发扬民主，废除封建法西斯教育，提倡尊师爱生，循循善诱，耐心说服，反对教师体罚学生，特别对后进生，更要满腔热情进行帮助。记得四年级有个姓杨的学生，屡次偷窃，多数教师要求将其开除，民青支部曾专门做了研究，动员周围师生对他们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使该生认识并改正了自己的错误，当上了班长。学校经过考察测验，还让他跳了一级。李敦仁对此大加赞扬，认为长安民青通过耐心说服教育转变学生思想的经验是十分宝贵的。汤小民主办学也曾使国民党当局大为恼火，一九四六年，国民党派到汤小的新任校长王增汉就曾公开宣称，他要以三分精力办学，以七分精力来消除汤小存在的民主毒素。

三、推选县参议员。一九四五年，长安县成立参议会，每乡要推选出一名县参议员。当时樊南乡镇民代表会预定我和一位姓何的为县参议员候选人。李敦仁对我说：“听说樊南乡镇民代表会要选举你当县参议员。我要把这个位子让给郑竹逸，叫他到县参议会搞上层活动，你在沿山一带搞基层武装工作，好吗？”（郑当时在西安师范学校任教，祖居樊南乡）我回答：“行”。李敦仁又笑着说：“我不叫你当县参议员，还要你帮助郑竹逸当选上参议员。”事后，我将樊南乡多数乡镇民代表邀请到汤小，宣传郑竹逸的人品才干，并在底下又做了许多工作。后来樊南乡镇民代表会经过选举，郑竹逸果然当选，这为民青在长安县搞上层活动提供了方便条件。

四、开展反霸斗争。一九四五年秋，樊南乡镇民代表会主席高作哲（地下党员）提出要清查乡上帐目，恶霸乡长郑福乾恫吓说：“代表会有人要算乡上的帐，不难，但不知咱手枪里这颗小铁丸是否答应？”不久，郑即派人将高作哲暗杀于红庙河畔。我将此事向李敦仁同志做了汇报，李敦仁和我商量，决定发动群众，开展反霸斗争。后来我又和郑竹逸同志商议拟定了“杀风不可长，必须严惩杀人祸首”的口号，由我在乡镇民代表大会上提出来，同时还建议由乡镇民代表会组织“呼吁清算委员会”。代表会同意了这个意见，当即推举王景珩、徐蒜管（地下党员）、樊效图、张志安、高作霖为清算委员会成员，开始了控告清算恶霸郑福乾的工作。迫于群众的压力，伪县法院拘捕了郑福乾，还给郑判了“一个半死刑”（杀人偿命，判死刑，横行乡里，包

肉多民，判“半个”死刑）。郑福乾之弟郑杰三，急如热锅之蚁，设宴请我和徐养哲等人，要求和解，我们声言“不吃人肉宴席”，拂袖而去。郑福乾之弟大福宴席的当天下午，郑竹逃来到汤小，发现郑福乾的狗腿子吴庆生（暗害高作哲的剑子手）在汤小门前监视，察觉情况有变。当夜，我又发现门外有暗影晃动，抬手一枪，匪徒仓惶逃去，面对敌人的威胁，我毫不畏惧。当地群众纷纷来校慰问，李敷仁同志写信要我们注意安全，肯定反霸斗争是完全正确的；他信中“霜叶红于二月花”的诗句我至今记忆犹新。后来，由于郑福乾的势力和多方活动，不仅“一个半死刑”的判决书变成一张废纸；而且郑福乾出狱后，还当上了秦岭守备区的营长。直到解放后长安县镇反中，才将恶霸郑福乾处决。

五、召开哀悼昆明“一二一”死难烈士大会，慰问《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报社编辑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昆明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三十多所大中学校实行总罢课。十二月一日，国民党当局出动军队，围攻各罢课学校，造成了“一二一惨案”。事件发生后，长安民青在汤小召开了“一二一”昆明死难烈士哀悼大会”，除汤小师生外，还有当地学校的部分师生及群众参加。哀悼会由我主持，在介绍“一二一惨案”经过后，全场默哀，师生中常启亚、李改棉等相继发言，控诉国民党的暴行，声泪俱下，全场上一片哭声，有的人竟嚎啕失声。这次大会，激发了群众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仇恨，使郁集在心头的义愤喷涌而出。

一九四六年三月，国民党发动反苏游行，特务分子乘机捣毁了《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营业部。民青组织进行了布署，一方面在汤小师生中大讲国民党破坏和平，压制民主，仇视进步的反动活动。一方面开展募捐，以示对秦风工商报的支持。所得捐款三、四百元由李致仁同志转交秦风工商报社，我和常启亚亲自到报社表示慰问。

六、积极配合开展武装斗争。一九四六年下半年，中共长社工委建立，我兼任武装委员。长安县民青组织配合长社工委开展了武装活动。一九四六年农历八月，在长社工委的领导下，发动了黎河武装暴动，支援新四军五师开辟鄂豫陕游击根据地的斗争。长安民青参加了武装暴动的活动是：常启亚、何明铎为长社工委筹备活动经费；赵生瑞在沿山一带进行联络工作；杨悦林护送工委领导李治进入山中；陈尊祥、何明铎按照统一布署，借武装斗争发起之机，发动了为了驱逐汤小反动校长王增汉的斗争。

一九四七年“六·二”县课斗争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武伯纯、张光远、郑竹逸三人被捕，民青组织又一次遭到破坏。长安县民青虽然失去了和上级组织的联系，但民青成员仍在继续坚持斗争活动。现在，当年长安民青的十五位成员，八人已去世，健在的七人也已离休。我们这些活着的老“民青”社员，都决心努力发扬过去的那种革命精神，为四化大业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一九八六年五月四日

民盟长安支部简史

孙福志

民盟长安支部于一九四五年五、六月间在长安汤房庙小学正式建立，由中共党员李志中同志担任支部主任委员，组织关系，由李志中直接和李敏仁同志联系。一九四六年二、三月开始发展盟员，到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共发展民盟盟员16人。先后发展的盟员有常启亚、陈尊祥、董崇义、何明钟、杨悦林、赵生瑞、史华、刘瑞珂、张淑阁、尤振邦、南帮杰、尤吉心、李亚隆（李志中是李敏仁发展的）。其中李志中、常启亚、董崇义等三人原是中共党员，当时因他们和上级党组织关系中断，就参加长安的民盟组织，以盟员身份开展革命活动，发挥骨干作用。一九四六年上级党委派高太同志来长安，恢复了李志中、董崇义的党组织关系。同年又批准了常启亚、陈尊祥等同志加入共产党。其他13名盟员，解放后中共长安县委根据陕西省委有关指示精神，陆续接收他们入党。

民盟长安支部从一九四五年成立到一九四九年解放，作了不少工作，以汤房庙小学为据点，积极开展革命活动，注意培养和发展进步力量。民盟长安支部，当时重视汤房庙小学教师的人选问题，为了发展革命力量，他们将外地的中共地下党员，如常启亚、姚文、王新茂、董崇义等，相继聘请来校，作为骨干并注意培养一批进步青年教师，如陈尊祥、何明钟、刘瑞珂、张淑阁等，把他们团结在

民盟支部周围，共同为办好学校，巩固革命据点而努力。

发扬民主，废除封建法西斯教育。提倡尊生爱生，坚持循循善诱，耐心说服教育，不许教师体罚学生。该校四年级有个学生，有偷盗行为，不少教师要求开除，经民盟支部讨论，发动师生共同帮助，结果使该生认识和改正了错误，他不但升了级而且当了班长。李敏仁同志对此事大加赞扬。

重视思想教育，关心国家大事。学校老师经常阅读进步书报，特别是李敏仁同志办的“民众导报”，全校订阅几十份，师生读报，蔚然成风。并发动学生到校外给群众读报，如江家沟的学生在群众的“老碗会”上读报时，竟遭到国民党军官总队的毒打。一九四五年国民党制造的昆明惨案，闻一多、李公朴被特务暗杀，学校立即召开悼念一二一事件死难烈士大会，不少师生在会上痛苦流泪，控诉国民党的残暴罪行。西安特务捣毁“工商秦风日报”社，师生开展募捐活动，并指派李志中、常启亚等同志到工商秦风报社慰问。

一九四九年，长安解放时，在中共长安地下党的领导下，长安的全体盟员，积极参与斗争，作出了不少贡献。如盟员南帮杰同志，对逃往翠华山的伪长安县县警进行策反工作，一次就扭下来九个警察所，缴获长短枪近百支。

(二)

长安解放前的盟员多数是共产党员，解放后，他们参加了军队和政府部门工作，民盟组织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了。

一九五〇年西安地区已经平定，陕西民盟组织对解放前盟员进行登记。何文涛（与西安民盟成员郑竹逸直接联系）填表登记上报批准为正式盟员，当时还有赵宏斌等共4人。同年，中共长安县委统战部召集民盟成员开会，组建民盟长安小组，何文涛被选为组长。

一九五二年前后，在长安一中发展了陈维忠、魏生斌、杨富裕、丁炳章等同志，一九五二年成立了民盟长安县区分部，何文涛、丁炳章、陈维忠、杨富裕被选为区分部委员，何文涛被选为主任委员。盟员分布于西安艺术学院、长安一中、小江村小学、太乙宫苹果园等地。盟员人数共15人。

一九五五年在陕西省盟部和长安县委统战部领导下，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开展盟的组织工作。在长安一中党支部、长安师范党支部、引镇中学党支部直接帮助下，积极发展盟员。这时包括上述三所学校连同小学等单位共有七个地方有盟员，长安一中、长安师范、引镇中学建立了盟小组。盟员总人数为25人。

当时，盟的组织生活在单位党支部领导下，一是配合党的各个时期的政治活动组织学习，开展讨论，打通思想，动员盟员积极投入政治运动，如“三反五反”、镇反等运动；一是以教学为主开展活动，协助党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并从学校实际出发，调查研究改进教学方法。盟员同志间对业务开展互助互学，如长安一中一位教师帮助一位盟员数学教师提高业务能力，获得师生的好评。对盟员中合理要求解决实际困难也及时向党支部反映。

一九五七年在整风运动开始，动员大鸣大放，一些盟员提了不少意见，但到运动中期和后期，扩大事实，无限上纲，把陈天人、何文涛、魏生斌、刘远村、郑守西等五位同志定为右派。有的给予降职降薪处分，甚至有的被判刑坐牢。

总之，一九五七年反右整风前，盟的组织生活繁荣活跃，大家畅所欲言有话敢说；反右整风后，盟员顾虑重重，组织生活会上，不是沉默寡言，就是说些不关痛痒的官话。

一九五七年后，盟组织在党的领导下，推动盟员参加大炼钢铁运动，向党交心运动、社教运动，并在教学改革中批判厚古薄今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积极投入思想改造运动，加强自我改造。

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四人帮”的毒害下，极左路线极左政策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一样遭受到“四人帮”的残酷的迫害，盟员挨斗、抄家几乎无一幸免，16人被关入“牛棚”，失去人身自由。一九七〇年上半年召开公审，清洗回家的有陈天人、赵志文、刘远村、何文涛、何广明等五位同志。盟组织完全处于瘫痪状态，停止一切活动。

(三)

打倒“四人帮”以后，党中央于一九七九年召开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订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实事求是地拨乱反正，清除左的思想，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入经济建设轨道

道上来，我国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国民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在中共长安县委的领导下，盟员长安支部恢复了。一九七九年九月，盟员中的冤假错案先后得到改正，恢复了工作，或办理了退休手续，计有陈天人、赵志文、刘逸林、何文游、郑守安、杨唯一、张存宽、何广济等8位同志。盟员同志在党的政策感召下，精神焕发，感激涕零，纷纷表示愿将毕生精力贡献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正如陈天人同志在一首诗中写道：“吴道体欠佳，何叹鬓已秋。百业俱兴兴日月，敢来显身手。挂拐杖，展愁眉，一腔热血育群英，当年百志今日酬。”

一九八〇年三月召开了第三次盟大会，选举孙福志、陈天人、陈维忠、魏生斌、高继显、何文游等同志为支部委员，推举孙福志为主任委员，陈天人为副主任委员，当时共有盟员21人。一九八一年退休盟员9人，平均年龄为62.9岁，老化现象严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是党的历史上政通人和的最好的历史时期，也是民主党派历史上最好的历史时期。由于落实党的统战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盟员同志个个精神振奋，心情舒畅，努力学习，大胆工作，不少同志在工作中做出了显著成绩，获得领导好评。

据一九八四年九月份统计：盟员1人被评为省劳模，2人出席省民主党派“双先会”，2人被评为市先进个人，2人被评为县先进个人，3人被评为单位先进个人。盟员中有市人民代表1人，县人民代表3人，县政协委员6人（包括副主席2人，陈天人、孙福志